

胡耀邦赵紫阳要求广大干部重视未来动向 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对策 把握时机迎头赶上振兴经济繁荣社会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今天说，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不久前要求广大干部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把握时机，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振兴经济，繁荣社会。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是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行的“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讲稿出版座谈会上，传达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意见的。

胡耀邦同志的主要意见是：我们的同志当中，认真在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的人，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状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大好信息。但是我们必须严重地注意到，现在还有更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某些做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对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多少兴趣，有的人以人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的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看成资本主义的糟粕。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那么经济战线广大干部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应当向愚昧作斗争，还是应当向什么所谓“自由化”作斗争呢？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必须好好防止和克服；但经济战线情况如何，还应作恰如其分的具体分析。这是我们大家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赵紫阳同志的主要意见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或者几十年之内，将会有这么一个新情况，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相应地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这个动向，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且应当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定我们在十年、二十年的长远规划中，特别在科技规划中，应当采取的经济战略和技术政策。未来的“工业革命”突出地说明了智力的重要性、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有人把它称之为“知识革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企业要现代化，关键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要发展现代化的信息系统，要普遍运用电子计算机等。没有相当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不行的。在就业人口中，不仅要中学水平的，大学水平的也要有一定的数量，要培养大量的硕士、博士。提出这样高而广泛的智力和知识的要求，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对培养人才，教育人民，一定要作为百年大计，加以重视，积极搞好。“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要做的事不止在教育、科技方面，它必然涉及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事先作出决策，作好安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我们把握时机，迎头赶上，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社会繁荣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试点取得明显效果和成熟经验 下半年全面推行投资包干责任制 国家计委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做好三件事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据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我国部分建设项目试行的投资包干办法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和成熟的经验。国家计委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今年下半年起，在建设领域中积极地全面推行投资包干责任制。

投资包干的办法是1981年开始在我国部分大中型建设项目和民用建筑中陆续试行的。在大中型项目中，主要是按概算包干、施工图预算包干；在民用建筑方面，主要是按平方米造价包干、小区综合造价包干。据到今年5月底的统计，我国一百二十三个按合理工期进行建设的项目中，约有三分之一的项目试行了这个办法。唐山、常州、沙市、西安、太原、沈阳、吉林、昆明等城市在民用建筑方面试行了这种办法。

包干责任制访问了国家计委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投资包干是提高基本建设综合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实行投资包干，一次包死，节约分成，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能够调动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当家理财的积极性，提高基本建设的管理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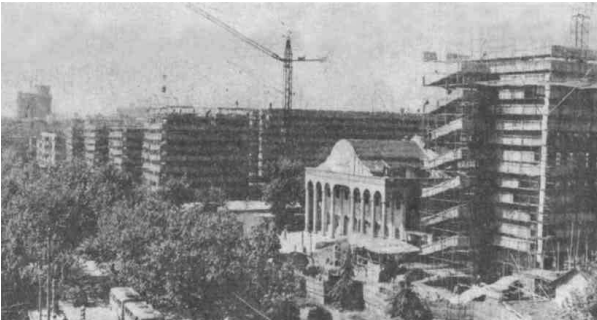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全面推行投资包干责任制，国家计委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做好三件事：一是组织力量做好包干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是把定额、单价等指标搞准，使包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二是切实把项目主管部门应当“保”的条件和包建单位应“包”的责任紧密结合起来。坚决杜绝只包不保、或只保不包的现象。三是包干的经济政策要兑现。

对包建单位的包干节余，一定要坚持按规定的比例分成，允许他们自主使用，任何单位和部门都不得平调。问：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和承包任务、经济效益显著、多数职工收入增加的企业领导人，经过考核、批准，给予向上浮动一级工资的奖励，浮动期为一年。连续两年获得浮动工资奖励的，正式晋升一级工资。

合肥金寨路 高楼拔地起

合肥市人民政府在金寨路改建中，实行受益企业集资和施工招标承包等改革措施。今年2月15日开工以来，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施工实现了高速度高质量。

鲁迅承编 (新华社稿)



(下转第四版)

本报西安6月23日电 记者景隆峰、通讯员林均报道：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正式投产不到一年半时间，生产彩虹牌彩色显像管已突破百万只。

这个厂去年正式投产。投产第一年，国家下达计划产量四十万只，总产值一点二六亿元，给予五千五百万的政策性补贴和照顾，并批准免征工商税。由于职工技术素质较好，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全年生产彩色显像管五十八万只，完成总产值一点八二亿元，不仅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补贴和照顾，还盈利三千零六十七万元，上缴工商税一百五十五万元。

该厂刚起步就提出了“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生产经营方针。在严格培训职工的基础上，厂里实行质量控制、图表管理等办法，保证了产品高性能和生产的高合格率。经过试验，其使用寿命现已突破一万七千小时。国内外用户经过测试和使用，证明彩虹牌彩色显像管具有亮度高、对比度高、聚焦性能良好、启动迅速、安全可靠、耗电小、寿命长等优点，获得了省优质产品和国家经委颁发的新产品“金龙奖”，并出口到国际市场。

目前，国内各整机厂主装的“金星”“福日”“北京”“牡丹”“长虹”“上海”牌号的彩色电视机，均采用该厂生产的彩色显像管。

“红眼病”“白眼病”都该治

现在有“红眼病”，也有“白眼病”。“白眼病”患者虽然没有从富裕农民身上狠捞一把的念头和行为，但对致富的农民却总是看着不顺眼：“姓‘社’，还是姓‘资’？”“白眼病”流行的地方，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努力，往往受到刁难、压制。农民要买辆机动车，办个证、申请个执照什么的，是很难的。

“红眼”、“白眼”表现不同，病因则一。都是由于没能正确领会党的富民政策，不能正确对待农民所致。“白眼病”并不难治。经验证明，只要多到乡下走走，认真了解一下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对比一下三中全会前后的市场供应情况，这种病，十有八九是可以治愈的。

先当知识的富人

江苏睢宁县农民鲍庭庭欲当养鸭万元户，但因不懂技术，盲目蛮干，结果倒赔了三千元。无锡有个叫黄鹌青的农民，先后养猪、兔、无菌蛋鸡、地鳖虫、蚯蚓等都获得成功。他的诀窍是懂科学技术，还出版了《人工繁殖地鳖虫》、《怎样养蜗牛》等书，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专家。

许多冒尖户的事实证明，智力正在成为致富的主要因素。不少农民深谙此理，热心学科学，许多地方出现了“打场学，送完粮，高高兴兴上学堂”的新气象。但也有一些人不注重智力投资，还是靠拼体力，靠“憨大胆”，见别人养兔兴旺就养兔，看邻里喂蚯蚓致富就喂蚯蚓，但不懂技术，结果万元户没当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看来，要当经济上的富人，必须先当知识的富人。

刘效仁



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整党中一定要认真解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严重官僚主义问题，这方面有严重问题的干部，要下决心撤换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6月16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听取了煤炭部党组书记、部长高扬文关于煤炭部通过整党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和煤炭战线整改方案的汇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认为：煤炭部党组的汇报很好，整党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抓得比较准，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有改革的决心和开创新局面的气魄，符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的要求，原则上同意煤炭部的改革方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希望各地区、各部委、党组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煤炭部的做法和经验，高标准地完成整党的各项任务，以整党促进经济和改革。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主持了这次会议。万里、习仲勋、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姬鹏飞、李鹏、吴学谦、宋平等，参加了会议。

煤炭部机关和在京单位的整党已经七个多月，在完成整党四项任务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进展。高扬文同志着重汇报了他们在整党中如何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和加快改革步伐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对他们的汇报很感兴趣，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高扬文汇报中谈到：整党开始时，部党组对整党到底要解决哪些主要问题，认识上很不明确，不太集中。胡耀邦同志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关于整党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的讲话，对他们启发很大。他们发动全体党员，主要是处以上的干部，议论煤炭部在整党中究竟要抓哪些大事，解决哪些主要问题，最后集中到四个问题上：（一）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质领会了没有？有没有抵触、怀疑或一时跟不上？有没有问题？（二）本部门过去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措施，哪些是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三）部领导机关对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特别是对到本世纪末实现煤炭年总产量翻一番以保证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任务，信心不足？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适应不适应？（四）为了开拓煤炭工业新路子，使煤炭工业很好地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哪些改革？

理出了这四条，煤炭部整党的主题就明确了、突出了。怎样围绕这个主题做好文章，他们有以下三点基本做法：

——从清理“左”的影响入手，端正业务指导思想。为了找准部党组存在的主要问题，他们在北京和到基层召开了多次座谈会，高扬文和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于洪恩还分别到露天煤矿和霍林河煤矿征求意见。通过对大家提出的三百六十八条意见的分析，他们认识到这几年来，部党组的思想虽然解放了一点，

查三种人工作的关键。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此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四川省委要求各单位领导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学习人民日报4月23日评论：《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以及《红旗》杂志第九期文章《增强党性，克服派性》等。通过学习，联系实际讨论，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分清是非，吸取教训，解决问题。

四川省委指出：历史已经表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集团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中的两派，都是“左”的产物，都是错误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确、哪一派错误的历史问题。对“文革”是否定还是肯定，是彻底否定还是所谓一分为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能否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清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好核

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煤炭部整党工作汇报 业务指导思想明确，有开创新局面气魄

希望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高标准完成整党各项任务，以整党促进经济和改革

希望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高标准完成整党各项任务，以整党促进经济和改革

希望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高标准完成整党各项任务，以整党促进经济和改革

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保证整党健康发展 四川对党员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

本报讯 记者罗茂城报道：最近，四川省委针对整党中出现的问题，决定集中一段时间，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一次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以保证整党的顺利进行。

目前，四川省级机关大部分单位已进入对照检查阶段。随着整党的深入，有个别单位出现了派性干扰，“明无山头暗有礁”，划划线，认为自己这一派

正确。有少数党员对“文革”的认识糊涂，以种种借口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解。而有的领导干部，对派性问题采取回避态度，甚至同情和支持。这样继续下去，整党就有走弯路、走过场的危险。

四川省委指出：历史已经表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集团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中的两派，都是“左”的产物，都是错误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确、哪一派错误的历史问题。对“文革”是否定还是肯定，是彻底否定还是所谓一分为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能否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清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好核

值得「研究」的合同书

本报记者段存章

集体提留合同书

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经过支部研究决定，1984年上村民委员会公积金、公益金三元（包括四属照顾金、代耕费、五包费）、管理费三元，民办幼儿教师统筹费一元，合计七元，限期于10月底前上交村民委员会，任何人不得任意拖延，特订此合同。

户主姓名，吴恒举，人四口，合计七十二元。

另外农田基本建设费每人暂定十元，水利粮二十斤。

孙徐村村委会

这份合同书是一个偶然机会得来的。

4月的一天，记者从江苏省徐州市到睢宁县采访。途中，司机送上一位老回乡探亲，汽车离开公路，驶进乡间土路，行十余里，来到孙徐村。

车停村口。记者随便走进路西一户农家（没有干部陪同），主人正在院里盖一间土泥房，他住的是破旧的草房，看样子生活不宽裕。四十来岁的吴恒举向记者介绍说：“全家承包七亩地，去年收小麦一千八百斤，交公粮七百零四斤，一亩地留种子三十斤，挖河交四十斤，剩下的不多了，今年口粮不够吃。”他领着我走进一间里屋，敲敲几口粮缸，都是空的。我问：“你家的麦子亩产为啥这么低？”他要在在一旁插话：“没钱买化肥，又不敢借贷款，后来向别人借了一百元，买回化肥上到地里时已经迟了，误了庄稼长”。说罢，她从抽屉里翻出这份油印的合同书，并对我说：“你瞧瞧，这上面我们要的东西有多少？”

我仔细端详，这不是一份合同书，而象一张通知书。当然也不能说集体提留的项目都是不合理的，比如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等，还是应该提留的。但是“另外”那个农田基本建设费，“每人暂定十元”，四口人就是四十元，还不包括交的水利粮，这个困难户能承担得起吗？



莫忘“吴恒举”

水工

孙徐村与农民签订集体提留合同书，本无可非议。农民的合理负担也是必要的。问题是这个合同书上只规定了吴恒举要上交的钱和粮，很象一纸空文通知书。吴恒举的家庭状况在当地属于“中间偏下”，温饱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

目前，农村商品生产日益发展，一些地方的农民先富起来，涌现出了一些万元户，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无庸讳言，万元户在总农户中只是极少数，有些地方经济发展不快，象吴恒举这样困难的家庭，甚至比吴恒举更困难的家庭，还为数不少，尤其是在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陲。对于这些农户，基层政权、基层干部应当和农民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呢？是先向农民伸手要钱，还是先伸手把

农民拉到致富路上呢？合同书最后的那个“另外”，到底派什么用场没有具体说。这几十元钱，几十斤粮，对于富裕户来说，小意思，不算什么，但对于吴恒举这样的农户，就是个天数字，就可能把他们压得翻不了身。致富的农民，总得先有个“小本钱”，然后扩大再生产，如果一下就把他们的小本钱”拿走，他们致富的本钱不就没了么？”

孙徐村就在徐州到睢宁的公路边上，各级干部来去往往，不知有没有到过吴恒举这样普通困难的农民家坐坐，听听他们的呼声。检查工作，如果只是走马一瞥，或者一扎头扎在万元户家里，那就不会知道吴恒举这一档的农民家庭是个什么样子。正因为如此，记者偶然得来的这份合同书，是很值得研究的！

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千万不要忘了“吴恒举”。

启东县建筑队在新疆烧砖

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施工的江苏省启东县建筑队，就地生产红砖等建筑用材，加快施工进度。建设和施工单位均受益。

启东县近几年先后派

出九千多人支援克拉玛依油田建设。过去红砖要从数百公里外的石子或乌鲁木齐用汽车运送，不仅每块砖的造价高达二角，而且也影响工程的进

度。

就地烧砖好处很多。以一块砖降低成本一角计，就为国家节约一千六百万，避免了约十六万车次四吨位汽车往返，还上交税金十九万元。启东县增加收入三十八万元。

朱维群 苏建中



五台县党参找销路

山西省五台县有多年的党参种植历史。今年预计收获党参七百万斤，但国家只收七十万斤，还有六百多万斤无销路。需求党的单位请去联系。

史双杨

王尚兵包飞机运鱼苗

湖北省松滋县五星乡养殖业专业户王尚兵，今年初与四川省威远县农科院和县土产公司签订了一百万尾鱼苗的销售合同。为了讲信誉、保质、量，早日成交第一批鱼苗，他在省民航航部门支持下，包了一架飞机，从沙市运八十万尾鱼苗飞往重庆。比轮船运节省时间近七十个小时，大大降低了鱼苗路途的死亡率。

董孙发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农工商联合社社长耿长锁，看到当地农民需要优质面粉，动员十二户农民集资入股，投资两万五千元，购置新型面粉生产设备，建起一座日加工优质面粉两万五千斤的面粉厂，4月7日正式投产。

工厂建立考核制度，严明奖惩；强调以信誉为生，存、求、发展。他们张贴

广告，向群众宣布：面粉质量不合标准，本厂保证退换，数量不够缺一补十。很快赢得了大批顾客。到10月15日，共加工面粉二十九万五千多元，十三个股平均每股收入二百三十多元。

人们夸奖耿长锁说：“老劳模有了新套套，更受人们尊敬了。”

王元奎

孙世昌建起家庭风力发电站

浙江省嵊泗县岛上的渔民用电难，有些地方至今还点油灯，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也无福享受。青年社员孙世昌在这里建成了四百五十瓦的风力发电站，今年4月发电成功。每天发的电不仅可供家里烧饭、抽水、电视、收录机使用，还可供村部分家庭照明。

汤小波 方斌

佛山扩大科技队伍有「三招」

本报 记者高庆报道：乡镇企业如何适应商品生产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广东省佛山市郊区乡镇企业的对策是：抓“三招”，加速人才开发和产品技术开发。

一招曰：不拘一格，多方培养、招揽人才。他们采取集中与分散、长期与短期、内训与外培相结合的方式，办训练班、办电大，选送人到华南工学院等院校代培，还专门培训了一批厂长、管理人员、会计、技术人员。此外，今年以来从上海、河南、广东招聘和借调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六人。

二招曰：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挂钩，企业为这些单位提供教学、科研基地，这些单位为企提供科技信息、帮助技术攻关。去年至今，联合陶化和有德技术转让项目四十多个。潮石窑厂，过去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后在华南工学院的帮助下，加强产品结构，调整原材料配方，改善生产工艺，二、二级品率由24%提高到60%，在去年广东省同行业评比中名列第三。

三招曰：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和许多家庭有亲属在港澳和海外的特点，大力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几年来，已同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合同一百多件，为国家创外汇几百万美元。



乌衣镇供销社招考农民营业员

安徽省滁州市乌衣镇供销社改革招工制度，通过考试从入股农民中录取了十名营业员。他们不端“铁饭碗”，服务态度好。

张荫曾摄（新华社稿）

丝路穆斯林经济开发公司在兰州开业

新华社兰州六月二十四日电（记者曹永发）一家由穆斯林发起成立的民间经济组织——丝路穆斯林经济开发公司，近日在兰州开业。

聚居于甘肃境内的回族同胞，自古以来就与阿拉伯国家有经济往来；聚居在海湾国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华侨，也希望能为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贡献自己力量，为了推进这一愿望，穆斯林的穆斯林发起成立了这家民间经济开发公司。公司董事长马祖灵说，公司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和商务合作，欢迎中外穆斯林经济组织前来投资、联合办企业、组织劳务输出，开展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活动。公司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

这家民间经济组织的成立，对密切中外穆斯林的经济联系，促进“丝绸之路”新的繁荣有着积极意义。

这些政策实施后，沈阳市出现了城乡结合，以城带乡的新局面。城市各工业部门和企业主动走出去，请进来，热情接待了一千八百多名县、乡干部，洽谈协作项目。市计委向乡镇企业提供产品信息。市经委组织扩散产品。市机电局组织了七天的技术招标会，当场就与乡镇企业签订合同五百多份。市科委组织全市十二个科研院、所、一次向县、区转让了十七项科研成果。市委成立了乡镇建筑联合公司，准备把市内住宅小区的建设尽量承包给农村建筑队。县、区乡镇企业也主动走访市内工厂和大中专院校，聘请技术人员。今年1至4月，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二亿零六百八十六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

雷进

城乡联营 能人下乡 产品扩散 沈阳发挥城市作用 发展乡镇工业

本报 辽宁省沈阳市充分发挥大工业城市的经济中心城市作用。

沈阳是以机械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雄厚，郊区农村自然资源丰富，有发展乡镇工业的优越条件。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时期片面强调乡镇工业“以小挤大”，而忽视它“以小补大”的积极作用，使全市乡镇工业发展缓慢，年总产值还不及苏州市的四分之一。

在贯彻中央今年四号文件精神中，市委认识到发展不发展乡镇工业关系到老工业基地能否焕发青春，在人才流动、供销、资金、工商管理、价格、税收等方面制订了扶持乡镇工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其中规定：凡自愿或派往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员，户口、人事关系不变，工资向上浮动一至二级，除享受聘用单位的福利待遇，还发给适当的补贴。

全市及时调整了乡镇工业的管理体制。市委要求郊区县、区的党委书记既要抓农业，抓流通，又要抓工业；各工业局长不能只当城市工业局长，也要管农村工业。结合“第三梯队”建设，全市统一选派了五百多名懂技术、会经营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乡镇企业，并吸收一批退到二线的老同志，参加乡镇工



本报记者 张安南 新华社记者 许一鸣 施坤亮

解放思想，敢于跳出现行体制，敢于标新立异，敢于担风险。正是在这一点上，某些领导同志固步自封，创优不创，改革不力。市委负责同志说：“我们是慢了，要总结教训，迎头赶上。要遵照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振奋起来。”

在市委和政府大楼，人们日夜忙忙碌碌，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后的实施方案和经济法规。在厦门大学和专家们，专家们在对特区扩大后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建议。……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反映也很强烈，许多外商、侨商对厦门特区有浓厚的兴趣，美、英、法、日等国的一些财团，直接派出代表赶到厦门寻求合作途径。厦门往返于广州、北京的航班，班班满员。厦门所有的外经机构客商盈门。来厦的外商中大财团多，谈大项目、尖端技术的多，签约的多。仅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总公司，短短一个月就接待了客商一百五十人次，签订合同五项、协议十九项。市旅游局也已同外商签约十个项目，投资达一亿二千万美元，并将于今年内全部动工。金融界对厦门更关注，美国建东银行和香港渣打银行迅即向厦门设立了代表处，美国渣打银行要求到厦门设分行，美国嘉利银行与上贷款三千多万美元给香港渣打集团在厦门投资。

上海、广西、武汉、辽宁等省市区有关

计院、研究所，都派出工程师前来承包规划、设计和科研任务；半个月之间，有六百四十三名科技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厦，要求来厦参加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工业部、中国民航局、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四川、贵州、浙江的一些单位，先后与厦门签约，合办工厂企业，从资金、技术、人才各方面支持厦门。

为了加强特区的领导，省委、省政府雷厉风行，由省长胡平、省委书记马兴元等同志带队，赴厦现场办公。省级七十多个部门打报告给省委，决心克服官僚主义，支持厦门“特区”建设，新事新办。省对外经贸委和计委，到厦门第二电子仪器厂和厦门造纸厂报建的引进项目，连协助他们办手续和审批，只用四天就办妥了。市政府决定第一批十五个企业的产品可直接出口，不必事事请示报告。基建招标、工资浮动、干部招聘，已经开始在一些单位试行。

势头很好，可以说这是厦门经济特区开办以来的最好时机。

● ● ●

厦门经济特区毕竟不同于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它有一个老市区，拥有二十七万人，共有五百八十八家老企业。改造任务相当艰巨。虽然前面还有诸多困难，但是，在党中央特区政策的引导下，工作在厦门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迎难而上，奋发图强，一定会开拓出新局面。

厦门特区大有希望！

厦门照片：湖里工业区近观。

本报记者 黄兴来摄

这真是一条新闻：洛阳市郊区金谷园村的农民不当当市民。

金谷园村在洛阳火车站附近，原有耕地一千二百亩。随着市政建设和新工业企业的发展，目前该村人均耕地已不足一分。去年下半年，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政策，要把他们全部转为吃商品粮的城市居民。谁知一经“民意测验”，几乎全村人都不赞成。

这里的农民为啥不愿当市民？村民委员会主任陈大海对我说：“过去，我们空守火车站，想卖面条卖洗脸水都不行，非要在一分地上‘闹革命’，当不当农民？可如今全村一千二百口人，五十亩薄地上只占用一百多劳力，其余的都参加了工商业或别的专业生产，与城里人有啥差别？”

她的话音刚落，旁边的村民纷纷说开了：

“现在农民男满六十、女满五十，都有‘退休金’，学生一毕业就有工作，不像洛阳市，还有待业青年哩！”

“去年俺村每个劳力月收入不下一百元。在村旅社当服务员，收入比市里洛阳旅社的经理还多呢！”

“俺们铜管加工厂去年每人十天假、六十元钱，让大家分批到北京去旅游，市里的厂矿可没有这项福利！”

坐在一旁的土建技术员开了腔：“市民有的俺都有，市民没的俺也有，俺就愿意当农民！”

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

彭明

重视人物传记研究,是我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司马迁著《史记》,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传记占了一百一十二篇,即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是人物传记。因此,这部著作通常被称为纪传体的通史。它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去揭示当时的政治状况、说明和判断历史问题。我国历代修史,都很重视《史记》这种体裁。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人物传记的研究。在国外,一些史学家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共四巨册,收入美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的有名人物的传记共五百九十五篇,约一百四十万字。我们且不论其观点和倾向性,单从它所涉及的人物之多,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传记的重视了。

在国内,海峡两岸都很重视民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台湾出有专门反映传记的大型杂志;一些民国人物传记的专著或回忆录,也出版不少,如曹汝霖在他所写的《一生之回忆》一书中,对研究五四运动史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虽然书中到处有以找到作者为自己辩护之词,但对于一些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参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撰写的《人物志》,计划编写约一千人的传记,现在已完成大半,公开出版已达三集,发稿则已达七集;再有若干年,便可全部完成。民国人物的专著,如《孙中山传》、《袁世凯传》等,也都出版有许多种。至于一些通史、专史或教材性的书籍,涉及到民国人物评价的,那就举不胜举了。

我个人读书不多,了解情况很不全面,现仅就所见、所闻、所想,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防止宣扬天才论、宿命论。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注意这种倾向。

我谈一点个人的回忆和感受。1948年,我在东桥坡,当时第三同志在那里修改他的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一本书。他经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聊天。他说:毛泽东同志告诫他,在写毛泽东本人的传记时,不要象国民党给孙中山写传那样。后来,我才了解:1948年春,晋冀冀出一小学课本,书中说毛泽东从小就是个打菩萨,破除迷信。毛泽东看后对周恩来同志说:这个课本就不是事实,我小时候不仅不打菩萨,反而为了母亲的病去拜过菩萨。进城以后,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到了这件事。他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国民党是怎样写孙中山传记的呢?我只记得小学课本上也有说孙中山从小就打菩萨的事。1976年,有机会读到了——解放前出版的孙中山的传记著作,才大开眼界,懂得了什么叫天才论、宿命论。

许多书都把孙中山描述成从小就具有革命思想的神童,有些书从翠亨村周围的风水来解释他的成长。最妙的是有人从孙中山的相貌上来解释,说凡是人的相貌长得象母亲,性格又象父亲的,都可以成为伟人!

这难道是科学的吗?当然不是。解放后,我们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当然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过去的影响并非一下就能消除的。有些传记著作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宿命论、天才论。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我们应该从社会条件和实践活动,来研究一下伟大历史人物的成长。

此外,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好话不怕说过头(因为“大方向”没错),缺点、错误不能讲。这几年,看党史人物传记,这一点特别突出。

封建史学家有所谓尊尊者讳、亲尊者、为贤者讳的史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无数革命先烈,老一代的革命家,虽然也是我们的尊者、亲者、贤者;但我们却勿须讳言。我们历史地分析一些伟大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并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前进的,使这些人更加可敬、更加可尊,更加可信、可学,这有什么不好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夺取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的中心——上海而发动的英勇斗争。这次起义震撼了全国和全世界,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早在1926年9月初,北伐军向江西推进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就开始了准备武装起义。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脱离孙传芳,归附北伐军。这一事件影响加速了起义的进程。17日召开的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进一步部署了起义行动,决定以罗亦农为起义秘密总指挥,李震瀛为公开总指挥。

10月23日下午5时,上海区委发出了起义的动员令。起义的计划是:第一行动,制造局;第二行动,闸北;第三行动,南市;第四行动,浦东。各区听到信号后,即夺取警察署和向孙传芳军队驻地进攻。但此时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我们的变化。首先是夏超叛变,23日被孙传芳队进占杭州,夏超于余杭公路上被击毙。其次是起义消息泄露,市内敌人已作戒备。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区委根据外电报纸报道,九江已克复,叶开鑫倒戈,仍决定按原计划发动起义。到预定时间,由于作为起义信号的军舰炮声未发出,以致大部分起义队伍没有发动起来。南市的起义工人袭击了警察署,但因孤立无援,不得不很快停止行动。起义中,优秀的共产党员奚佐尧、陶静轩被牺牲。

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党总结了教训,以更大的勇气准备第二次起义。

1927年2月11日,上海区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政治局决议案为起义规定了正确的方向。2月18日,北伐军进占杭州。同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时,忽然传来北伐军已打到镇江的消息。会议当即决定举行总同盟罢工。从19日起,四天内参加罢工的工人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序言

黎澍

吴晗(1909—1969)是一个勤奋、正直、诚实的史学专家。1934年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讲授明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南下,任教于昆明云南大学历史系。以后,又任教于西南联大。他一贯爱好自己的工作,以研究明史有名于世。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肆无忌惮地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残酷迫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人民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对。全国性民主运动随之高涨。吴晗不再埋头书斋了。他提笔奋起,为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呐喊、反独。明史这时成了吴晗手中的战斗武器,他在1943年写了一本谈史的私人著作,名为《“醇粹”到“皇权”》,又名《明太祖》。四十年代末,又改写为《朱元璋传》。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许多后来编入《历史的镜子》一书中的借古喻今的短文,极力抨击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派,他和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和进步学生结成了知心朋友,在黑暗中寻求着光明,为一个勤奋的、正直的学者,奋起而为反法西斯的爱国战士,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成了著名的民主人士。

全国解放后,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并在1957年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这是吴晗由一个爱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转折。他担任副市长后,当然工作繁忙,但并未因此放弃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活动。他是新中国历史学三大项目——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重绘中国历史地图的发起人之一,他担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同各大院校和中国历史教师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历史学界许多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他同历史学界的联系,对普及历史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希望“使人人懂得自己和其他人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他把普及历史知识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以富有远见的精神主持了两种历史小丛书,一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每本一二万字,他自己写的《海瑞的故事》就是其中一种。1966年以前,《中国历史小丛书》出了一百四十七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了五十九种,多由他亲自组稿和改稿,可谓煞费苦心。普及工作所需要的渊博的知识和勤勤恳恳的办事精神,在他身上都获得了突出的表现。

吴晗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多年时间里利用余暇改写《朱元璋传》,自谓原书“指掌寥寥”,缺乏历史态度。改写宗旨在充实内容,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一本翔实的科学著作。对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很用了一番功夫。有人讥讽他改此书,“无非是要稿费嘛”。实在太冤枉了。试问一个作者前后费二十二年时间,四易其稿,最后写成一本共几十万字的著作,所得能几何?因为拿了这点微不足道的稿费,竟竟问于人,其实何损吴晗!适足以说者自身的写照而已。此外,他还经常为报刊撰写知识性随笔,有时积极应召写号,写些配合政治需要

人来说,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坏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人民日报》1983年12月9日:《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我觉得文中的观点和原则,在评论民国人物时,也是适用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写了汪精卫和杨度,比较实事求是,反映得很好。汪和杨是民国史上两个不同典型的人物。一个是由好变坏,一个是由坏变好。我们并不因汪的后期变坏而否定他在同盟会时期的功绩,也不因杨的后期变坏,而否定他在筹安会时期的劣迹。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才能使读者从科学的历史中得到真正的教益。

旧是军阀,也不一样。新军阀和旧军阀不一样,就是旧军阀,各派系的人物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要把各派人物的特点写出来,不要写得千人一面。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切忌简单化。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古人。那当然是只能一概否定。如说“宋教仁是个议会迷”,这显然是套用了六十年代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火说法。翦伯赞同志生前就对这个说法很反感,他说宋教仁是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不搞议会,又搞什么呢?的确是这样。在当时,议会民主比较封建专制制是一种进步吧!

民国史的研究上必然会遇到一个广大的中间阶层,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中间阶级、中间党派是客观存在,

的历史论文,如《论海瑞》等。

吴晗最后成了悲剧人物。一些戏剧界的朋友大概因为他常常参加一些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鼓励他写剧本。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写出一个别开生面的历史剧,以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由于有这些朋友的帮助,他才破胆而出,以历史学家而从事戏剧的创作,几经修改,终于写成。这个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个以廉洁和正直敢言闻名的清官。剧本写了这个清官。可是这个剧本在现实舞台上却成了一个悲剧的序幕,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用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借端,吴晗在这个大阴谋下被罗织罪名,大张挐伐,致以身殉。当年提倡学习海瑞,本来意在用一个封建社会的巨匠作榜样,鼓励发扬民主,批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现象,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响应这个号召而招杀身之祸,构成举世震惊的文字狱,善良见嫉,情理反成。吴晗的悲剧就在这里。这个悲剧的动人之处,使人深感憾憾,也在这里。

吴晗去世以后十年,冤狱平反,人们思念他,惋惜他,同情他的遭遇。为发扬他的史学成就,过了十四年,即1983年,北京市历史学会决定编辑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并以纪念今年他诞生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全书四卷,约二百余万字。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选集,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吴晗曾将自己手订的一个集子取名为《春天集》,表达了他对祖国美好前途的向往。尽管十年内乱造成了巨大的曲折,“四人帮”倒台又经历了三年徘徊,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毕竟春光大道,百花齐放。吴晗的这部选集,不愧是花丛中绚丽的一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将是类似的悲剧的结束,永远不会再重演了。

中间路线是不主观意图,它们不是相同的概念。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和中间路线也不是一回事,要作具体分析。当国共两党斗争激烈,又是一种暂时现象,一方力量较弱,而暂时强大的一方又走向法西斯专制主义统治的时候,中间党派主张的出现并不是坏事,它对法西斯化起了削弱和牵制的作用。所以法西斯主义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但当解放战争达到进行决战的时刻,弱的一方已经变强,进行反击和进攻,而原来强大的、一方的统治将被推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期,再出来宣扬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批判中间路线只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对极少数人讲的。

因此,在全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处于统一战线中的各中间阶级、势力、民主党派所起的作用,应给以具体的分析和估价,特别对其中有些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应分别立传,使其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在修史,建议民国史的传记工作者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共同研究。当然,首先还要加强征集和丰富这方面的资料。

写好民国以来知识分子传记,使其在民国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民国人物传》各卷,都给予了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篇幅,这是很对的。今后还应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这是作者在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面进行了认真的准备:第一、利用孙传芳兵败、粤军毕庶澄部接替孙传芳防守上海而出现的间隙时机,迅速恢复了被打散的组。第二,成立了宣委,出版了《平民日报》、《工人快报》、《上总通讯》等多种刊物;组织了宣传队,散发传单,举行演讲,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第三,加强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召开了全市工人紧急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工人武装自卫、积极准备总同盟罢工等二十二条斗争纲领。第四,进行了市民政府的筹建工作。3月12日,召开了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推选由各阶层代表三十一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第五,特别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军委,从购买枪械、调查敌情、训练和整顿武装起,直到制定起义计划,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组织并训练了三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

3月17日,松江方面的北伐军向浦南进攻,孙传芳军队向上海退却;苏州附近的吴淞也为北伐军攻占。在此形势下,上海人民革命斗争情绪空前高涨;敌人内部矛盾崩解,纷纷倒戈投降。筹备上海的军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宣布归附北伐军,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接着率领停泊在吴淞口外的三艘军舰驶赴九江;毕庶澄也秘密派人与北伐军接洽投降事宜。

起义的时刻临近了。19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作出了21日全市“一致动作”的决定。下午2时半,罗亦农发布了起义预备动员令,命令各区、各业业总工会作好准备,随时等待命令。

3月20日傍晚,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龙华。起义的条件成熟了。根据党的决定,

战时最后集中在北火车站。由于敌人纵火焚烧民房,使北火车站一带成为一片火海,造成起义队伍在巷战中进攻的困难。但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冲向北站,形成围歼之势。战士中人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顽强搏斗。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陈独秀派人送信给罗亦农,要工人停止战斗,向大场方面撤退,被罗亦农拒绝。下午6时,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上海工人阶级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攻下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起义胜利后,3月22日第二次临时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十九名市政府委员中,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等共产党员占了九名。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后,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上海工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老革命家和上海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金再发)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但没有一个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是这方面的一部专著。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最近已由中央党校《求索》出版。《(双)“唐虞禅让说”的《法家意识》》(农村述本),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宇)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出版

